

关系摩擦与美日同盟

刘卫东

内容提要：去年以来美日间的摩擦明显增多，其实这并不新鲜，它只是两国深层分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反映而已，同时也是双方在小泉后时代向国家间正常关系模式回归的表现。当前同盟的维系纽带依然牢固，调整机制依然健全，在某些领域的合作还在加强，但摩擦也削弱了互信，并将催生更多独立于同盟的个体行为。今后双方摩擦会更加常见，但同盟不会迅速瓦解，而是会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条件。

冷战结束以后，美日同盟经历了短暂的漂流阶段，然后迅速得到加强，并在小泉和布什任内发展到双方自称为史无前例的密切程度。但即使在小泉时期，美日之间就已出现一些不和谐音符，安倍上台后两国的摩擦更多，甚至有专家怀疑美日安保体制处于崩溃边缘。¹探明美日摩擦的表现与性质，将有助于分析美日同盟的现状和未来。

一、近来美日间的主要摩擦

安倍上台后，美日间的摩擦明显增多。日本对美国的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与朝鲜和解的速度过快，美国正考虑将其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删除，这对日本坚持在绑架事件解决以前不与其和解的既定国策造成重大冲击；二是美国众议院就日本政要否认慰安妇存在的言论举行听证会后，日本政府采用多种手段试图阻止提案通过，但美国众议院还是于2007年7月30日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

安倍上台后，美日间的摩擦明显增多。

¹ 美日学者多次谈及对同盟现状的担忧，美国亨德森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日高义树在日本《呼声》月刊2007年第12期上发表的文章，甚至直接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处于崩溃边缘。

此外,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于2007年3月突然公开了日本最新发射的两颗间谍卫星的绝密资料,也令日本大为不快。

而美国对日本的不满,主要是自民党政府撤回一直为驻阿富汗盟军提供后勤保障任务的自卫队舰艇的行为。尽管美国国务院为此数次发表讲话,甚至直接派员与民主党首交涉,仍未能阻止日本的撤军行动。此外,日本前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在伊拉克战争和美军驻日基地调整问题上对美国的指责,麻生外相在首届中东四方会谈上“美国人干不了的我们日本人来干,日本人有威信,我们从没在中东进行过剥削和使用武力”¹的表态,以及安倍上任七个月后才访美,且在此期间日本外相与防卫大臣均未访美的反常举动,都让美国心有不安。

其实美日间的不和在双方关系异常密切的小泉时代即已存在。²此外,美日围绕美军驻日基地的权利义务的讨价还价,F-22战斗机的出口解禁与否,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问题的讨论,以及牛肉贸易等问题的争执也一直没有停息。

二、对美日摩擦的解读

当前的美日摩擦只是双方诸多深层分歧的外在表现。

显然,当前的美日摩擦只是双方诸多深层分歧的外在表现。两国一直以来的成功合作主要是基于互有所求背景下的求同存异,小泉时代美日首脑私人关系的密切及其强人政治的特色也淡化了两国原有的分歧。但随着国际局势和美日国内政治的演变,摩擦增加在所难免。

(一) 两国摩擦的历史回顾

美日摩擦已有几十年历史。除了众所周知的贸易战,以及两国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争斗,其他领域也争端不断。如美国国会干预日本事务的情况早已有之。1981年11月,美国参议院出台了要求日本将防卫费增加到占GNP 1%的议案。³1987年7月又全票通过要求日本开放食品市场的提案。⁴1994年2月,为报复细川政府断然拒绝美国实行出口配额的要求,美国国会宣布对日本恢复动用“超级301条款”。美日之间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也一直相互提防。20世纪90年代,美国拒绝向日本转让其根据许可证生产的F15J战斗机上的中央处理器技术,使其国产率只有55%。⁵从1993年起,美国要求日本转让其掌握的材料和电子技

1 “日本正热忱地展开独立的中东外交”,[日]《世界日报》,2007年3月22日。

2 如美国不支持日本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众议院议长海德给日本驻美大使写信谴责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未和美国商量就访问朝鲜等。

3 高坂正尧、佐古承、安部文司编著:《战后美日关系年表》,东京:PHP研究所,1995年,第168—169页。

4 同上,第216页。

5 颜一:“美对日武器研发严密设防”,《当代世界》,2006年7月下,第18页。

术,日本也总以“武器出口三原则”为由加以拒绝。¹美日围绕日本准备自行研发的F-2战斗机的较量更是广为人知,最终导致一架飞机的两个主翼分别在太平洋两岸制造。²即使在政治领域双方的摩擦也并不罕见。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归来之后,围绕美日同盟是否包含军事合作关系的问题,日本国内产生激辩,首相将责任推卸到外务省,导致伊东外相的辞职;1987年9月在美国要求下,中曾根首相表示日本要为协助扫除两伊战争在波斯湾留下的水雷做出积极贡献,但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以向纷争周边地区派遣自卫队有被卷入纷争的危险为由强烈反对,终使这次派遣未能成功。³

(二) 两国摩擦的深层因素

美日的战略分歧及对同盟的不同认识是导致摩擦不断的根本原因。首先,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础是确保其和平稳定与繁荣,而日本的目标在于维护其在东亚的地位和特殊利益,在面对朝核问题及中国崛起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时,两国的反应自然不同。⁴其次,美日对同盟战略作用的认识不同。美国希望防范中国和控制日本,美日同盟的存在可以同时实现美国对中日的战略构想;⁵而日本认为同盟是抗衡中国崛起并获得美国支持的工具,它希望利用同盟发展为正常国家。再次,双方在新时期的目标定位不同。美国的目标是通过解除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束缚来推动其发挥更大的协同作用,核心是面向未来的全面合作;而日本则期待全面推翻二战后安排的对其的束缚,进而获得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其核心是对历史的修正。第四,在两国总体上具有共识的强化军事合作方面,美国关注的是双方在导弹防御、联合指挥、海外用兵等“共同利益”方面的合作力度,而日本的重心则是借响应美国的要求来遏制对手并提高“个体”的防卫能力。在美国推崇的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日本政界人士虽多有同感,但在是否需附加“在联合国框架内行使权利”等条款上存在明显分歧。这些目标差异不断刺激着两国摩擦的产生,并注定了其反复性和持久性。

美日的战略分歧及对同盟的不同认识是导致摩擦不断的根本原因。

1 华山:“日本欲抢占军事制高点”,《解放军报》,2001年7月9日,第5版。

2 美国一直要求日本购买F-16作为替代战机,日本则希望独立发展。双方长期争论后妥协的结果,是美日以F-16为模板合作研制新战机,美国提供部分技术和资金,日本与美国分享所有最终成果。F-2在机体制造的分配上,整机由三菱重工组装,并负责机身前段和左翼;川崎重工负责机头、进气口段与水平尾翼和垂尾;洛克希德沃斯堡厂负责机身段和右翼。据人民网2001年11月5日。

3 [日]加藤秀治郎编:《日本的安全保障与宪法》,南窓社,1998年,第62页。

4 日本政府在《21世纪日本战略报告》中对于美日战略优先顺序的不同有明确认知。见金熙德:“面临崛起的中国——解读‘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环球时报》,2003年1月17日第五版。

5 栗德金:“为后小泉时代做准备,中国应该铭记自己的失误”,《华盛顿观察》周刊,2006年2月15日。

(三) 美日摩擦的性质分析

当前的美日摩擦并非新鲜事物,只是原有分歧的新表现而已,国际和双方国内环境的变化是主要原因。首先,美日新的相互期待不同步。同盟原有模式一直是日本提供资金基地、美国保护日本,现在美国期待日本更加主动,而日本显然没有做好走出原有“惰性”的准备,不愿为了美国的利益承担风险;其次,日本追求正常化的效应逐步显现。美国在对日政策方面一直是自身利益至上,在国际事务上背叛日本也非首次,原本一味忍让的日本现在之所以敢于表现不满,就是因为新的政治意识使之不再甘心遵从旧有的关系模式。实际在经济领域,美日早已超越同盟关系的制约,转而在国际框架内依据各自利益解决纠纷,现在日本期待把这一相对平等的模式推广到政治领域,美国同样也不适应。再次,日本国内因素的作用。日本国内争当政治大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兴起之后,民众对于政府过于亲美的表现早有疑义,自民党内鹰派人物奴性十足的效忠美国盟友的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反感,因为这与他们言论中民族主义的论调是格格不入的,¹而同盟关系正好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筹码,反对党可借顺应民意来扩大自身势力,对美国说“不”只是其制衡执政党的手段,如果民主党上台组阁,仍会沿袭与美国合作的基本国策。

当前的日本对美外交只是在小泉后时代对于国家间正常关系模式的回归,其原因在于小泉的过于亲美,而不是安倍和福田的过于厌美。

同时应该看到,当前的日本对美外交只是在小泉后时代对于国家间正常关系模式的回归,其原因在于小泉的过于亲美,而不是安倍和福田的过于厌美。安倍将追求国家正常化的目标放在首位,即便这样做偶尔会造成它与华盛顿之间的不和也在所不惜。²现在的福田只是将美日关系重新定位于小泉和安倍之间的适当位置。所以,当前的摩擦只是美日调整关系的必经阶段而已。从历史上看,美日协调关系的方式始终随动于新摩擦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毕竟远多于分歧,谁也不愿同盟受到实质损害。实际上,在当前摩擦出现之时双方的妥协就已开始。美国众议院只是口头表决通过了慰安妇提案,参议院没有参与,故其对美日政府都无约束力。为了自民党能在参院选举中获胜,美国众议院也照顾了日本的要求,将表决推迟到其选举之后,而日本各界对此的反应也相当低调。在朝鲜问题上,美国专注于核议题的解决,这也是日本的首要利益,一位外务省的干部解释了福田首相的看法:“为朝鲜正名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朝鲜核设施的去功能化能顺利进行,绑架问题就能同时解决。”³福田本人也在会见布什时表示:“日本将在包括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

1 [日]格温戴尔:“自民党衰落了吗?”《日本时报》,2007年9月20日。

2 Richard Katz and Peter Ennis, “How Able Is Ab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7.

3 [日]“亚洲和美日同盟”,《每日新闻》,2007年11月14日。

删除等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合作。”¹至于日本的印度洋派兵问题,美国官方相对克制,白宫发言人斯诺在谈及此事时表示,美日同盟仍极为重要,延长供油活动是日本的内政问题。²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表示,即使暂时中断,其后如恢复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就好,只要能维持积极的外交政策,就能弥补损失。³而福田政府的持续努力也已见成效,日本众议院不久前否决了参议院的决定,通过了新的海外派兵法案,并在美国的压力下删除了“供油活动仅限于反恐任务”的条款。

三、维系同盟纽带的再认识

美日尽管摩擦不断,但维系同盟的纽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未明显减弱,很多方面甚至还有所加强。除了至今仍在发挥核心作用的共同战略需求外,价值观因素也明显提升,尤其是日本官方对此的强调力度不断增强。此外,还有两个因素的作用也更明显:

(一) 机制性因素

长期以来,美日同盟的不断加强及制度化建设已在美日间形成了涉及各个方面的相互渗透,这首先表现在美日已建立了多层次的沟通系统,除了首脑热线、美日共同委员会、2+2会谈以外,驻日美军的联合司令部也在建设中;其次,多年的密切合作还造就了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均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尤其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界精英多具在美接受培养的背景,他们具有强烈的亲美倾向,这赋予同盟稳定的人力资源保障;再次,战后的经济立国及和平宪法的束缚使日本在政治、安全和海外贸易通道等方面高度依赖美国,其权力结构和经贸活动也与美国密不可分,⁴“这两个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们可以在一些细节上持有不同意见”。⁵而多年的依赖也使日本政坛形成一股易于接受美国压力的决策惯性。⁶第四,由于美日同盟的核心是安全合作,同盟本身对于任何可能削弱这一核心的因素都具有敏感的自我纠正能

1 [日]津田步发:“沉默是金的福田外交”,《读卖新闻》,2007年11月22日。

2 Press Briefing by Tony Snow, September 12, 2007,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7/09/20070912.html>.

3 [日]“安倍之后不透明的日本外交”,《朝日新闻》,2007年9月13日。

4 不仅日本宪法和政体是由美国审查通过,而且安倍上台后新增的安全委员会、首相辅佐官、准备设立的首相直辖的国家情报部等,都是美国现有机构的翻版。2007年3月日本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后,日本的军事指挥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挥模式也极为相似。

5 Robert Pahre, *Leading Questions: How Hegemon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9.

6 迈克尔·阿马斯科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国驻日大使说日本》,于铁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美日同盟的核心是安全合作，同盟本身对于任何可能削弱这一核心的因素都具有敏感的自我纠正能力，其他争端一旦白热化，安全合作就成为终极灭火剂。

力，其他争端一旦白热化，安全合作就成为终极灭火剂，这时两国舆论很快就会有反省，双方政府往往也会迅速出面协调，防止摩擦进一步升级。

（二）观念性因素

美国的对日政策，既是建立在对日本民族主义现状的客观估计之上，也是建立在对日本政治、经济、安全走向拥有巨大影响的自信之上的。¹有美国学者认为，日本总是喜欢与领导者走在一起，而与其他力量相比，美国现在仍是更易接受、更加亲密和更值得信赖的领导者。²美国“要比日本所有可能敌人的总和更能触发日本国内的外交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的反应和争论”。³尽管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美国的不尽相同，但日本……在那些不直接影响本国利益的国际事务中，通常采取以美国的是非为标准的方针，以所谓“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的名义对美国的外交举措和军事行动大都采取推崇、追随或默认的态度。这种做法以不与日本的根本利益直接发生严重冲突为限度。⁴日本精英对美国的国际地位的认识、民众对于美国国际形象的看法虽不断摇摆，但50年来没有人认为美日同盟不再重要，日本甚至已惯于接受基于实力对比现实之上的同盟地位不对称。美国对同盟的重视虽不如日本，但政府内始终存在着维护同盟的稳定意识和不断反思的传统，一旦同盟有削弱迹象，政府就会提升其地位，1990年代中期的“奈报告”、新世纪的两个阿米蒂奇报告，都是美国主动要求强化同盟所为。于是，本来作为互利工具的同盟在很多时候已经被“目的化”，维护同盟成为不能触碰的底线，由此也形成了可靠的观念保障。

四、摩擦中的美日同盟

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双方摩擦的共同塑造下，当前的同盟正处于“根基稳固但变量增加”的状态中，同盟的调整将围绕这一特征展开。

（一）同盟的根基依然稳固

美日双方都极其重视同盟。即使在单边主义盛行时期，美国也在一直试图寻

1 孙承：“小泉、安倍政权交替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第42页。

2 Reinhard Drifte, *Japan'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From Economic Superpower to What Power?* Great Britai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 68.

3 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4 金熙德：“美日同盟的再定义及其未来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第15页。

求盟友的合作。对美国来说美日同盟极具价值,这不仅因为日本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而且在这个同盟中美国的相对地位最高,同盟可供开发的潜力最大,日本当前的正常化诉求基本也未超出美国的接受范围;而日本追求实用主义,只要美国的国际地位不变,以美为唯一盟友的日本追随美国的国策就不会改变,它也不会像德法那样出于理想主义而非实利与美对抗。日本评论家冈崎久彦认为:“日本近百年外交的真谛是:最佳政策是和美英结盟并与之合作,而非与别国结盟或保持中立。”¹还有人相信,美国是日本的力量源泉。²近年来日本对美国的忠诚甚至显得有些固执。³因此,同盟尚不具备发生巨变的条件。

(二) 同盟的调整机制依然健全

美日双方对于约定俗成的同盟底线抱有共识,一旦美国强硬,日本就会主动放弃原有宏图进行妥协并在新框架内寻找新的机会;而只要日本表现出明显的决心,美国也会反思日本的价值,为照顾日本的利益适当变通自身要求,或给予日本一定补偿。当前日本追求更大自主性的举措虽引入更多变量,但双方对于同盟至上原则下的互谅传统仍有共识,且这种妥协机制经多年实践已相当成熟,不致轻易失效。

(三) 同盟内的合作正在强化

当前美日对同盟的战略价值出现不同认识,但在两国具有共识的领域,以及在对方重视也于己无害的议题上,双方的合作正在加强。日本原来一直存在“被卷入”的恐惧,但当前追求正常化的目标正激发出它更多的自我忧患意识和改变现状的动力,这正好迎合了美国期待日本更加外向的战略企图,“9·11”以后美日在全球反恐、民主推广、军队再编、情报共享、海外行动等领域的合作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密切程度,在发展多层次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日本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国际伙伴。⁴而在主要涉及单方利益的伊拉克战争和钓鱼岛争端等问题上,当事方也得到了盟友的明确支持。

当前美日对同盟的战略价值出现不同认识,但在两国具有共识的领域,以及在对方重视也于己无害的议题上,双方的合作正在加强。

(四) 同盟内部的互信有所削弱,成员更加追求独立

美日合作的强化并不能掩盖其双边关系的日趋复杂化:一是经贸摩擦更多向政治领域扩散,摩擦中不断出现原来没有的新议题;二是对威胁认知的分散化导

1 冈崎久彦:《日本防卫大战略》,美利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1—92页。

2 [日]西尾干二:《日本的根本问题》,新潮社,2003年版,第53页。

3 彼得·卡赞斯坦:“美国帝国体系中的中国与日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6页。

4 “日本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导弹防御合作伙伴”,美国国务院《参考要闻》,2006年3月10日。

致维系同盟的外在压力下降,两国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增大,基于各自复杂利益考虑的国内因素在决策中的地位提升;再次,两国关系中原本一直存在的所谓“惯例”在新形势下逐步瓦解,双方利益对抗从姿态上发展到行动上,在非共同利益领域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第四,国家之间的利益计算更加细分,某些议题的纠纷增多可能伴随着其他议题的合作加深,就事论事区别对待的模式在同盟框架内得到更多体现。这表明个体利益在同盟中的地位上升,由此带来的背叛增多降低了彼此的信任度,尽管双方对于维护同盟的重要性仍有强烈共识,却开始怀疑同盟的稳定性,导致同盟成员更加担心关键时刻是否能从对方得到应有的合作,并被迫开始独立应对挑战的准备。

当前,在美国的国力越来越难以维护其全球利益、美日对中国崛起产生了不同认识、日本追求正常化的努力难以阻挡这些史无前例的因素的冲击下,美日同盟同时表现出强化和削弱的特征,强化源于对共同利益合作力度需求的增加,削弱是因不同的个体利益的逐步突出,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促使同盟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当前美日关系之所以备受瞩目,皆因安倍、福田时期的“摩擦”与小泉时期的“蜜月”反差强烈,但同盟并未处于崩溃边缘,这既非双方的主

现在美日同盟还处于深刻调整的初期,相互需求虽有变化但总体稳定,甚至美主日从的关系模式也变化不大。

观愿望,也不是对当前合作现实的全面认定。现在美日同盟还处于深刻调整的初期,相互需求虽有变化但总体稳定,甚至美主日从的关系模式也变化不大。¹只是面对新的摩擦,双方还须在如何实现利益自保的同时努力满足对方要求的方式上进行磨合,但维系同盟的共同愿望会使双方尽快相互适应,并继续在同盟框架内通过妥协解决分歧。

五、美日同盟的演变前景

美国希望日本只动手(出手帮助美国)不动脑(追求独立意识),这与日本的期待相反,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只能是同盟向权利义务均衡的方向发展。

当前的美日同盟已进入又一个明显的调整阶段,这一进程在新的世界格局形成和主要大国相对力量稳定之前不会停止。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同盟今后将展现出如下特征:首先,同盟不会迅速瓦解,而是会向利益主导的合作形式转化,这是近期的大方向;其次,共同利益的减少导致各方会采取更多独立于(但不会损害)同盟框架的行动,全局削弱局部增强,长期削弱短期增强,重点局限于就事论事,这将成为新的合作模式;再次,美国希望日本只动手(出手帮助美国)不动脑(追求独立意识),这与日本的期待相反,

¹ 如美一再警告日本从印度洋撤军会损害同盟,却奢谈与朝鲜妥协的对日负面影响;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美国对美日关系的危机感,但这在美国的重视程度明显不高;在高官互访中,美国的要求日本表示一定会解决,日方的要求美国仅表示理解。

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只能是同盟向权利义务均衡的方向发展,这虽是双方都不情愿的,却也是最终都能接受的“最小公倍数”,但成员间相互地位的调整将是逐渐而缓慢的;第四,由于共同外部威胁的降低,同盟内部的摩擦会愈发常见,这将成为一种常态并为各方所适应,在此期间同盟会不断表现出引人注目的摇摆态势;第五,虽有人预测美日同盟能够再正常维持50年,¹但其未来将难以沿袭美英同盟的模式,²而更可能是美德关系的翻版,也不排除再度发展为二战前美日关系的模式,这主要取决于日本演变的方向和程度。基辛格曾说:“就像人体有DNA一样,民族也有DNA。仅因为一次战争失败就不打仗,日本不是这样的国家。”³日本的成熟需要时间,而其结果可能给世界带来新的震惊。⁴

从近期看,不论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日本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这一点从希拉里和麦凯恩在《外交》杂志上的政策辩论就可见一斑;福田内阁及其后的日本政府同样也可能出于各种考虑而对美日同盟进行微调。但同盟的重要性不会因为美日政权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乃至今后双方政权的更迭而发生明显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为提高自身在同盟中的地位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在美国需要配合以及具有妥协余地的领域同时施展力量,一边协助美国达成目标,一边逐步蚕食美国的控制能力;美国的施压效果将逐步递减,被迫放弃全面主导,转而采取重点控制,通过讨价还价确保日本在关键领域的基本合作,抓大放小,突出重点。也就是说,美日会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演变,继续通过对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来不断调整关系,努力和平方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推动同盟向着联系内在化、目标外向化、地位均衡化、职能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 约翰·提尔帕克:“美日军事力量对接从空中开始”,《国际展望》,2007年第14期,第62页。

2 这或许只是美国的一相情愿,至少日本政府不是这样认为。小泉政府制定的《21世纪日本战略报告》指出:因双边关系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日美关系不可能成为美英型的密切关系。参见金熙德:《面临崛起的中国——解读〈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

3 [日]日高义树:“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处于崩溃边缘”,《呼声》月刊,2007年12月号。

4 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副外相、后任驻联合国大使的小和田恒曾提出,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它不仅要有政治经济力量,而且要有比美国小、但等于或强于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参见韦民:“论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进程及其发展方向”,《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第77页。这是当时日本对于正常化目标的具体规划,显然其政治和军事抱负让人无法低估,经历过珍珠港事件的美国人对此更有感触。